



证据委员会报告

为决策者、证据中介和以影响力为导向的证据生产者敲响警钟并指明前进道路

— 要点总结 —



应对社会挑战的全球证据委员会

版权所有© 2022 麦克马斯特大学。保留所有版权。本报告采用创作共享署名4.0国际许可证授权。未经出版商事先书面许可，不得以任何形式改编本报告的任何部分。

本报告和其中包含的信息仅供参考和公共利益所用。虽然秘书处和委员们已努力确保撰写本报告时信息是最新和准确的，且按原样发布，无任何形式的明示或暗示担保。本报告中包含的信息并非用于替代财务、法律或医疗建议。

麦克马斯特大学、证据委员会秘书处、委员们和出版商对因使用本报告中包含的信息而直接或间接造成或据称造成的损失或损害不承担任何责任或义务。麦克马斯特大学、秘书处、委员们和出版商明确否认因使用或应用本报告所含信息而产生的任何责任。

本报告的出版商是麦克马斯特卫生论坛（McMaster Health Forum）（地址：加拿大安大略省汉密尔顿市主路西1280号米尔斯纪念图书馆417号，1280 Main St. West, MML-417, Hamilton, ON, Canada L8S 4L6）。麦克马斯特卫生论坛代表证据委员会，欢迎读者对本报告提出任何反馈和影响报告建议途径的意见。请将您的意见或建议发送至邮箱 evidencecommission@mcmaster.ca。

本报告的引用：

应对社会挑战的全球证据委员会。证据委员会报告：为决策者、证据中介和以影响力为导向的证据生产者敲响警钟并指明前进道路 [The Evidence Commission report: A wake-up call and path forward for decision-makers, evidence intermediaries, and impact-oriented evidence producers]。汉密尔顿：麦克马斯特卫生论坛；2022年。

ISBN（印刷版）：978-1-927565-33-9

ISBN（网络版）：978-1-927565-39-1

引言

COVID-19使政府、企业、非政府组织、各类专业人士和公民对证据产生**百年一遇**的关注。为了应对快速变化的挑战，人们对证据的需求前所未有。在非常紧迫的时间内，通过提供最佳证据满足需求，人们做出了巨大努力。当然，这一切并非顺利。一些决策者故意忽视最佳证据，另一些决策者则在传播错误和虚假的信息。除了最佳证据，还依赖许多其他方面，而且某些形式的证据比其他证据更被依赖。全球最佳证据综合存在主题覆盖不均、质量参差不齐和未进行更新的情况，以及由于缺乏合作而造成的巨大研究浪费。但是COVID-19证据响应的许多部分确实进展顺利，例如，快速多国家随机对照试验、动态证据产品以及为政府政策制定者提供快速符合实际的证据支持。

其他社会挑战，如从教育成就到卫生系统绩效再到气候变化，也同样需要重新关注最佳证据。新冠疫情更清楚地揭露了一些根深蒂固的挑战，例如风险暴露和缓解风险方法的不平等。其他暂时被搁置的“逐渐崭露头角”挑战，现在需要被重新考虑。此外，我们还认识到需要更好地准备应对未来不可预测的危机，包括但不限于未来的突发卫生事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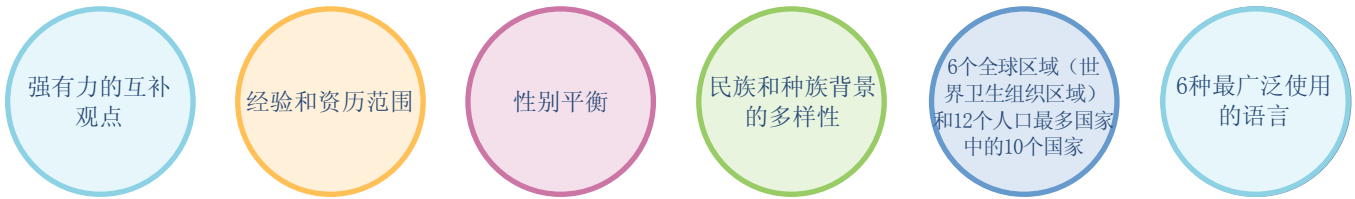
现在是时候将如何顺利使用证据进行系统化，完善诸多不足之处。这意味着创造使用证据应对社会挑战的能力、机遇和动机，并建立结构和流程以维持它们。现在也应平衡使用证据与判断力、谦逊和同理心。对于那些寻求使用证据来应对社会挑战的人来说，需要赢得并积极维护合法性。成立全球应对社会挑战的证据委员会是为了支持人们开展这项重要工作。

我们在本报告中使用的“证据”一词是指**研究证据**。研究人员开展研究，决策者则可以使用由此产生的证据。理想情况下，他们会使用与需要回答的具体问题最匹配的证据形式，并且认识到在大多数情况下，证据和行动之间通常不是一条直线（例如，不是所有的问题都有相关的证据，有的证据也可能质量很低或对其环境的适用性有限，并且可能存在严重的不确定性）。决策者也可能使用其他形式的证据，例如从他们自己的生活经验中得出的经验性证据和法庭上被考虑的司法证据。决策者在做出决策时还需要考虑许多其他因素。例如，政府政策制定者需要关注制度上的限制（包括资源

限制）、利益集团的压力、他们自己的个人价值观以及公民的价值观等因素。我们的重点是支持政府政策制定者、组织领导者、专业人士和公民这四类决策者在应对社会挑战时更好地利用证据（尤其是研究证据）和其他因素。

本要点总结的前六个部分提供了支持证据委员会建议的背景、概念和共享词汇。**公平**是贯穿整个报告的主线。这六个部分不仅可以为能够做出必要改变以确保持续使用证据来应对社会挑战的人们使用，还可以供其他许多人使用。第七个部分概述了证据委员会关于我们如何能够且必须在日常和未来全球危机中改善证据使用的建议。

经过精心挑选，形成了证据委员会的**25名委员**，并在审议过程中提出不同观点。作为不同类型的决策者（政府政策制定者、组织领导者、专业人士和公民），他们在大多数类型的社会挑战（和可持续发展目标）以及所有主要形式的证据方面经验丰富。委员们来自世界各地，拥有广泛的经验和资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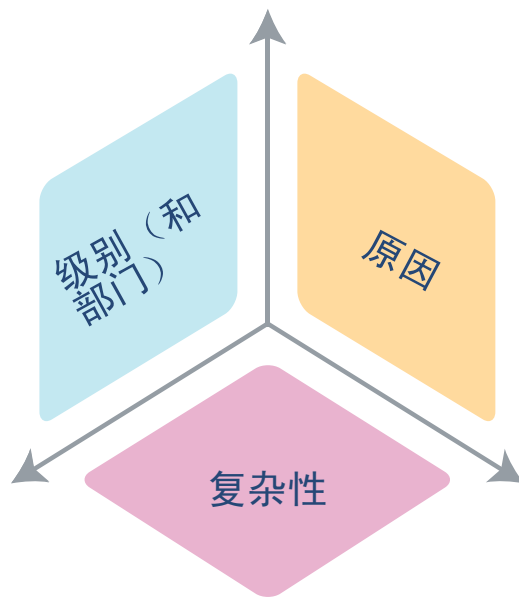
证据委员会通过以下方式**建议和完善**了过去的工作。



本证据委员会报告包含**52个小节**，可分别从证据委员会的网站下载。部分小节的草案在证据委员会工作的重要时刻公开，用以征求关于如何加强此部分的反馈意见并开始准备建立行动。这些小节通常包括一个或多个信息图表，易于在演示文稿、报告和其他格式中使用。证据委员会鼓励您“自由分享，标明出处，经许可改编”。

社会挑战的本质

一项挑战可以从它通常被应对的级别、被标记为一个值得关注问题的原因，或是从潜在问题的复杂性等方面进行审视。我们在下面给出了社会挑战的实例，重点放在它通常被解决的级别（和部门）以及潜在问题的复杂性上。



通常应对挑战的级别（和部门）	国内部门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卫生系统未能改善健康结局和照护经验 • 学校面临的虚拟教学困境 • 生活水平下降
	国内跨部门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抗生素耐药性 • 基于性别的暴力 • 不平等程度日益加剧 • 对机构缺乏信任 • 未能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全球（或区域）协调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COVID-19疫苗接种的不平等模式 • 气候变化

潜在问题的复杂性	简单	因果关系易于识别，解决方案可能涉及单一行动
	复杂	可以确定原因，解决方案可能涉及规则和程序
	非常复杂	有些原因可以确定，有些是隐藏的，有些可能是其他原因的结果，解决方案是多方面的，可能需要在实施中进行调整
	“多维复杂度”（危险）	原因更加复杂，因为现状可能成为原因，也因为反馈的循环运作，所以解决方案是高度具体的，错误或不合时宜的解决方案可能使问题变得更糟

一项挑战的其他维度可以包括时间范围（例如，健康和社会服务对经验和结局的影响通常可以在几周和几个月内进行评估，而气候行动的影响是要建立几十年和几个世纪的模型）和利益相关者的复杂性（例如，一些挑战可以与一个组织良好的利益相关者协会讨论，而其他挑战需要与大量不同规模和资源的团体，包括民间社会团体接触）。一项挑战可以被消极地表达（作为一个问题）或积极地表达（作为一个目标或力量来建立）。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原住民经常倡导的基于优势的方法就是后者的实例。

决策和决策者——证据的需求

人们可以在冲动（通常是习惯驱动的无意识过程的一部分）或思考（包括发现和使用证据的深思熟虑且有意识过程的一部分）后决定是否以及如何采取行动。对于后者，**将决策过程看作一系列有助于明确可能提出问题以及决策性质的步骤**，即使许多人根本不遵循步骤，或不按顺序遵循。在这里我们介绍了重点关注的两种决策者类型（政府政策制定者和公民，包括社区领袖）。

步骤	政府政策制定者的决策	公民或社区领袖的决策
理解问题及原因	考虑政府所面临的其他问题，我们是否应该关注这一问题？	考虑我关心的人和社区所面临的其他问题，我是否应该关注这一问题？
选择解决问题的方案	我们是否应采取行动解决这一问题，如果是，应该选择哪种方案？	我是否应采取行动解决这一问题，如果是，采取什么行动（例如，与他人交谈改变他们的行为，与其他社区成员合作制定当地的解决方案，或联系民选官员）？
明确实施考虑的因素	我们是否应采取额外的步骤来增加所选方案按照预期发展的几率？	我是否应与社区成员合作，并鼓励民选官员采取措施，确保所选方案惠及我所关心的民众和社区？
监测实施和评估的效果	我们是否应采取额外的步骤，以获取我们讲述一个成功故事所需的数据，或者在必要时纠正我们的进程？	[如上所述]……确保我们拥有所需的数据，从而知道我们是成功还是失败？

证据委员会重点关注**四类决策者**：政府政策制定者、公民、组织领导者、专业人士。每种决策者都可能以不同的方式进行决策。在这里我们提供了每种决策者使用方法的实例，并认识到这种方法可能会得到其他方法的补充（例如，政府政策制定者在支持他人决策方面也发挥作用，包括资助或“建立”他们所使用的证据）。



政府政策制定者

需要确信存在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可行的政策和有利的政治活动



专业人士

（例如，医生、工程师、警察、社会工作者及教师）

需要机遇、动机和能力来做出专业的决策，或与个人用户进行共同决策



组织领导者

（例如，企业和非政府组织领导者）

需要一个商业案例来提供产品和服务



公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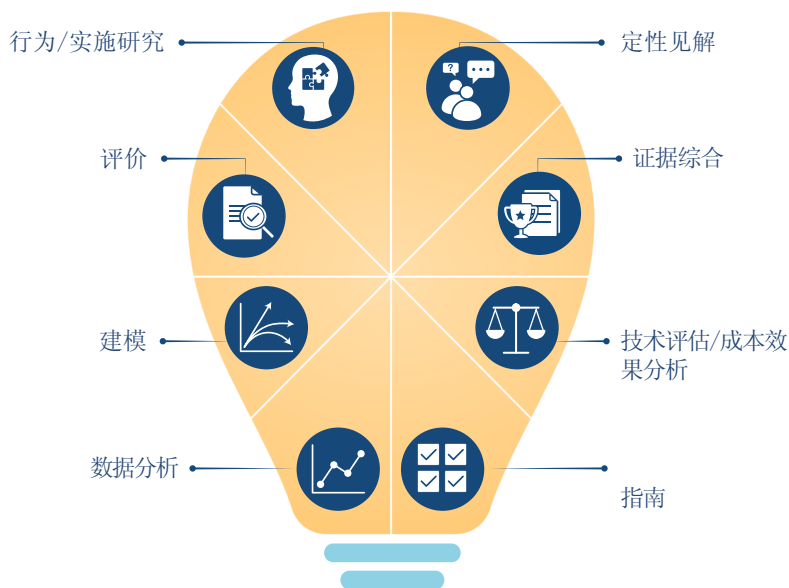
（例如，患者、服务使用者、选民和社区领袖）

需要机遇、动机和能力来做出个人决策，采取当地行动或发起社会运动

人们身兼多职，可能拥有多个角色的经验。例如，政府政策制定者也是公民，过去可能受过医生或教师培训，在当选或被任命为政府官员之前可能领导过非政府组织。

研究、综合与指南——证据供给

决策过程中通常会遇到八种不同形式的证据（如“灯泡”图所示），这些形式相互关联。比如，随机对照试验的评价也有可能包含基于数据分析、定性见解和成本效果分析的证据。同样，案例研究可以采用关于经验和偏好的定性见解，也可以使用来自数据分析、建模和评价的定量证据。



决策过程中的每一步都可以描绘有价值的证据形式。证据综合通过对解决一个相似问题的所有研究中已知和未知信息进行总结，可以帮助回答几乎所有相关问题。对于利弊相关问题，证据综合无论是在方案选择还是在实施策略中都至关重要。

步骤	相关问题	有帮助的证据形式示例
理解问题及原因	指标——问题有多大？	数据分析
	比较——问题是否越来越严重或者比他处更严重？	数据分析（例如，使用行政数据库或社区调查）
	框架——不同的人如何描述或体会这个问题及其原因？	定性研究（例如，使用访谈或焦点小组）
选择解决问题的方案	利——它可能带来什么好处？	评价（例如，有效性研究，如随机对照试验）
	弊——可能出现什么问题？	评价（例如，观察性研究）
	成本效果——在相同的投入下，某个方案能否获得更佳效果？	技术评估/成本效果评估
	适应性——我们能否对在其他地方行之有效的内容进行改编并同样获益？	评价（例如，过程评估即评估一个方案是如何以及为什么发挥作用的）
	利益相关者的观点和经验——哪些群体支持哪个方案？	定性研究（例如，使用访谈和焦点小组来了解什么对于公民来说重要）
明确实施考虑的因素	促进和阻碍因素——什么（和谁）会妨碍或帮助我们在恰当的人群中实现并获得预期的效果？	定性研究（例如，使用访谈和焦点小组来了解促进和阻碍因素）
	实施策略的益处、危害、成本效果等——我们应该采用何种策略并在合适的人群中实现并获得预期的效果？	行为/实施研究 见“选择方案”
监测实施和评估的效果	所选择的方案是否能惠及那些能从中受益的人？	数据分析
	所选择的方案是否在足够的规模上实现了预期效果？	评价

决策者同时需要**本土证据**（例如，从他们自己的国家、州/省或城市学习到的东西）和**全球证据**（从世界各地学到的东西，包括不同群体和环境间的差异）。对于“本土”我们是指国家和次国家，其证据可表现为多种形式，包括本土数据分析、本土评价和本土实施研究。全球证据通常采取证据综合的形式，我们将在下文讨论此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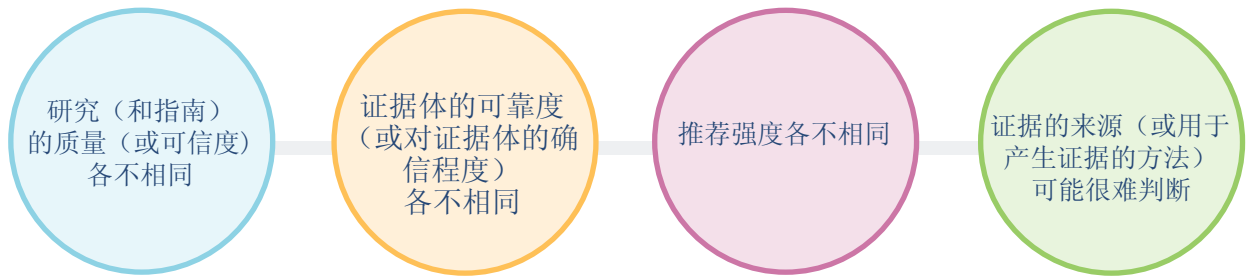
决策者可以从基于本土和全球证据的推荐意见中获益。从定义上来看，指南提供推荐意见。在危机时期，我们最初通常必须依赖于新出现的指南（例如，尽管我们还没有足够地了解危机，但在此期间需要好好洗手），然后依赖于更新的指南（例如，我们现在有证据表明戴口罩可以减少病毒传播）。在任何时候，我们都需要对所谓的“逆转”持开放态度，也就是说随着证据的不断积累，原本认为有好处的方法实际上并不奏效，甚至会造成伤害。技术评估可以提供建议，也可以通过可能对影响本土决策的社会、伦理和法律因素的评估补充现有证据，从而提供一种证据支持。

建模是最常见的本土证据形式。然而，它可以提供一种在全球范围内综合最佳证据的方式，正如在气候行动、药品报销和宏观经济政策等高风险领域所做的那样。建模也可以为本土证据形式提供支持，其中建模者有效地充当了一种证据中介。这种情况就如同政府政策制定者利用许多特定辖区的COVID-19模型来预测封城等方案可能产生的未来影响（以及最重要的不确定性）。如果做得好，这种应用或不应用证据综合效果估计的建模可以有助于系统地给出专家意见。

优势	证据形式
本土（国家或次国家）证据 	 数据分析  建模  评价  行为/实施研究  定性见解
全球证据 	 证据综合 证据综合通过系统和透明的过程来识别、筛选、评价和综合解决同一问题的所有研究。其目的是为了全面了解现有的知识，包括其结果在不同人群（如女孩和年轻妇女）和环境（如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间的差异。对于方案选择的问题，现有的部分知识可以在何种环境下何种方法对何种人有效。
根据地方和全球证据得出的本土（国家或次国家）推荐意见或者证据支持 	 技术评估  指南





其他形式的分析，如政策、系统和政治分析，可以为本土和全球证据提供信息或加以补充。政策分析可以帮助厘清政策问题及其原因，制定解决问题的方案，并确定实施方面的考虑因素。系统分析可以帮助了解谁可以就当前挑战做出何种类型的决策（治理安排），应对当前挑战的资金如何流动（财务安排），以及如何努力应对当前挑战（例如，项目、服务和产品）以惠及需求者（交付安排），并了解未来哪些系统安排可能需要改变。政治分析帮助明确是否有亟待解决的问题、可行的政策和有利的政治活动（例如，机会窗口），以便立即采取行动；并确定若当前并非最佳时机，如何才能打开机会窗口。

不是所有证据都是高质量和可靠的决策依据。许多（但不是所有）形式的证据都有相应的工具，可用于帮助判断证据（单个研究或证据体）的可靠性。这些工具通过评分或评级的方式帮助使用者了解对证据的确信程度。现在许多期刊要求作者遵循报告规范，如适用于随机对照试验的CONSORT和适用于证据综合的PRISMA。大部分期刊并未要求审稿人使用特定工具评价研究质量或推荐强度；因此发表在同行评审期刊上的并不一定都是高质量文章。



决策者通常遇到的四种证据形式当前可以作为“动态”证据产品，这意味着它们会随着新数据的增加或新研究的发表而定期更新。许多这样的动态证据产品最开始是作为COVID-19证据响应的一部分。除卫生部门外，其他部门存在的数量较少。举例如下：

许多政府政策制定者和其他决策者已经开始期待COVID-19证据的定期更新，可能开始询问为什么不能为其他高优先级的社会挑战提供这样的产品。原因是这些挑战存在显著的不确定性，而且证据的产生很可能会解决这种不确定性。

证据形式	动态证据产品示例
 <p>数据分析</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WHO的COVID-19综合网站提供了一套为应对COVID-19而采取的公共卫生措施的严格程度的数据分析，英国卫生安全局的监测报告 (bit.ly/3DeaSlc) 提供了一套关于英国COVID-19的数据分析，机遇与洞察力 (Opportunity Insights) 公司的经济追踪器提供了一套COVID-19对美国人民、企业和社区经济前景影响的数据分析。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的经济活动每周跟踪报告提供了一套大多数OECD和G20国家经济活动的数据分析。
 <p>建模</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欧洲COVID-19预测中心每周都会对每10万人中的病例和死亡人数进行预测——包括总体预测和国别预测，而卫生计量与评估研究所COVID-19预测中心每两周更新一次COVID-19的预测死亡人数模型，包括报告为因COVID-19死亡的人数和实际因COVID-19死亡的人数，可用于探讨特定国家的一系列情景（例如，关于口罩使用和疫苗接种）。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每五到七年提交一份评估报告，该报告借鉴了人类引起的气候变化模型、其影响和可能应对的方案，尽管严格来讲，这是一个通过稳健的模型间比较过程（每份评估报告由不同的科学家进行——见bit.ly/3wKQy8D的一个例子）的模型结果（可能是或不是动态的）的综合。
 <p>证据综合</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COVID-END动态证据综合#6每两周针对COVID-19疫苗对抗变异株的有效性进行一次更新，COVID-NMA每周更新一次关于所有药物治疗COVID-19的证据综合（后来又增加了预防性治疗和疫苗）。 全球碳计划 (Global Carbon Project) 基于建模和实证研究，每年更新全球碳预算（气候变化下人为二氧化碳排放及其在大气、海洋和陆地生物圈中的重新分配）的五个主要组成部分的估计值及其相关不确定性。
 <p>指南</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WHO关于COVID-19药物的动态指南每一至四个月进行一次关于COVID-19药物治疗的更新，澳大利亚国家COVID-19临床证据工作组每周为澳大利亚卫生专业人员更新COVID-19循证指南。 英国教育捐赠基金会为学校提供动态指南作为其教学工具包的一部分，例如涉及教学助理干预的指导。

许多个人和团体提出了他们所谓的证据来应对社会挑战。特定国家（或次国家）环境下的“最佳证据”——来自于当前最佳研究的国家（或次国家）证据（例如，在该环境下学到的东西）和来自当前最佳证据综合的全球证据（例如，我们从世界各地学到了什么，包括它如何因人群和环境的不同而变化），需要区别于有时被作为证据的“其他证据”，如单个研究、专家意见、专家小组、研究兴趣小组、“包装为案例研究”的轶事、白皮书和辖区范围经验综合，这些其他的证据都会带来风险（下文第2列）。同时，有一些方法可以从它们那里获得更多的价值（下文第3列和第4列）。

其他证据	存在的风险	解决方法	更好的改进措施
单个研究 (包括预印本)	“一手遮天”，或关注由作者及其媒体关系办公室或其他人积极推动的每项研究（关于羟氯喹的高偏倚风险研究和现已撤稿的关于疫苗与自闭症之间联系的研究）	要求使用得到广泛认可的质量评价工具对研究进行批判性评估（以了解偏倚风险），并需要认识到具有统计学意义的显著性水平（0.05），在20次试验中仍旧会有一次偶然情况发生	将该研究添加到“动态”证据综合中，使其能够与解决相同问题的其他研究一起被了解（或将其与最佳全球证据放在一起，视为许多国家或次国家证据之一）
专家意见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 “基于权威人士”（而不是以证据为基础）的决策，或关注那些凭借坚持、声誉或其他因素获得最大关注的人（就像被广泛观看的电视节目《少年监狱之旅（美版变形记）》（Scared Straight）中预防犯罪的节目一样，即使在证据综合发现有害无益的证据之后，仍旧可能发生类似于电视节目中的情况）	请专家分享其观点所基于的证据（最好是证据综合），以及用于识别检索、评价、筛选和综合证据的方法	让专家参与研究特定的证据综合对特定管辖区的意义，或用不同形式的证据挑战思维方式（或问专家什么证据能让他们相信自己是对的）
专家小组	GOBSATT (good old boys sitting around the table) 提供他们的个人意见	要求小组成员分享他们的意见和推荐意见所依据的证据（最好是证据综合），以及用于检索、评价、筛选和综合证据的方法	在小组（或秘书处）中增加方法学专家，预先传阅本土（国家或次国家）和全球的最佳证据，提供强有力的审查，并明确哪些推荐意见是基于何种强度的证据
辖区范围经验综合	“群体思维”，或许多管辖区域的人依靠一个管辖区域的人，他们愿意分享他们的经验和创新，但尚未对其进行评估	要求或寻找任何可用的支持性证据或产生证据的计划	

COVID-19大流行是一场全球性危机，需要政府高层针对几波“浪潮”快速做出决策，同时还面临着证据的显著不精确性和快速演变（通常是间接的）。在许多地区，COVID-19大流行期间证据似乎在政府的政策制定中发挥着比过去几十年更显著的作用。尽管如此，错误信息盛行，公民和其他利益相关者难以理解为何证据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相比最佳证据，“其他证据”往往更受关注，一些形式的证据往往比其他形式的证据更受关注。

COVID-19决策者更常遇到的除最佳证据外的“其他证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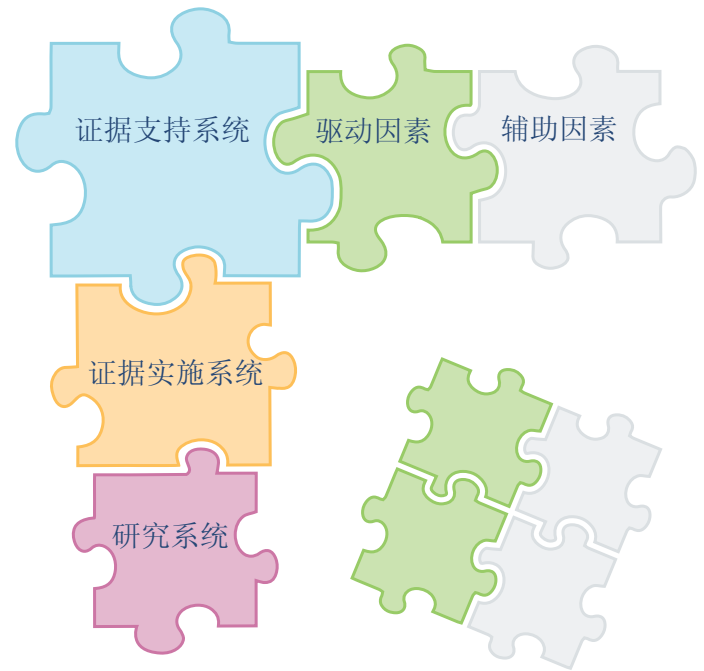


COVID-19决策者更常遇到的证据形式



每个国家都有一个国家证据基础设施，包括许多与证据相关的结构和流程。在国家证据基础设施中，我们区分了证据支持系统、证据实施系统和研究系统。加大对证据支持系统的重视并对证据实施系统持续保持关注，是未来使用证据应对社会挑战的关键。

当决策者，尤其是政府政策制定者和组织领导者提出问题，需要使用现有的证据及时提供支持。决策者，特别是专业人士和公民需要强有力的证据支持，以实施所需的改革。同时，研究人员需要发明新的产品和服务，开发新的思维方式并批判现状。还需鼓励研究人员更积极地与决策者接触，以确保相关性和适用性，更有效地利用技术使研究过程更有效率、更透明地报告研究成果，而不是“杜撰”，并创建生产证据的模式，便于决策者获取、理解并采取行动。从研究中出现的“即将进入全盛时期”的证据，可以被纳入证据支持和证据实施系统。



证据支持系统
<p>基于对国家（或次国家）环境（包括时间限制）的理解，以需求为导向，并侧重于以公平敏感的方式为决策提供符合情况的证据</p> <p>基础设施示例：</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证据支持协调办公室（适用于所有政府部门，在关键部门或部委设或不设额外办公室） • 证据单位，在八种证据形式中各有专长（例如，行为见解单位） • 提出证据需求并确定其优先级，在规定的时间内找到并打包满足这些需求的证据（并构建额外证据作为持续评估的一部分），培训使用证据的能力（例如，证据使用研讨会和手册），促进证据使用（例如，内阁提交清单），并记录证据使用（例如，证据使用指标） <p><i>虽然此类基础设施与政府政策制定者和大型组织领导人最为相关，但类似的基础设施也可以为小型组织领导人以及专业人士和公民量身定制</i></p>

证据实施系统
<p>基于对证据相关过程的理解，以考虑综合供需为导向，专注于综合证据、制订推荐意见、将其传播给决策者、积极支持证据实施、评估影响，并在下一个循环中吸取经验教训</p> <p>基础设施示例：</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证据综合和指南单位 • 证据实施单位，确定实施内容的优先次序，确定实施的促进和阻碍因素，并设计解决阻碍和利用促进因素的策略 • 将证据构建到现有工作流程（例如，电子客户记录、数字决策支持系统、门户网站和质量改善措施）中，并在其中分享证据 <p><i>虽然此类基础设施与专业人士和公民最相关，但类似的基础设施也可以为政府政策制定者和组织领导人量身定制</i></p>

证据中介的作用

顾名思义，证据中介即在决策者和证据生产者之间开展工作的机构（或个人）。他们通过最佳证据支持决策者，并利用洞察力和机会使证据产生影响，用以支持证据生产者。证据中介有多种类型，包括那些倾向于将大量精力专门集中在使用证据支持决策的中介。其中一些证据中介可能使用其他称呼来描述自己，如知识经纪人。他们可能会使用不同策略支持最佳证据的使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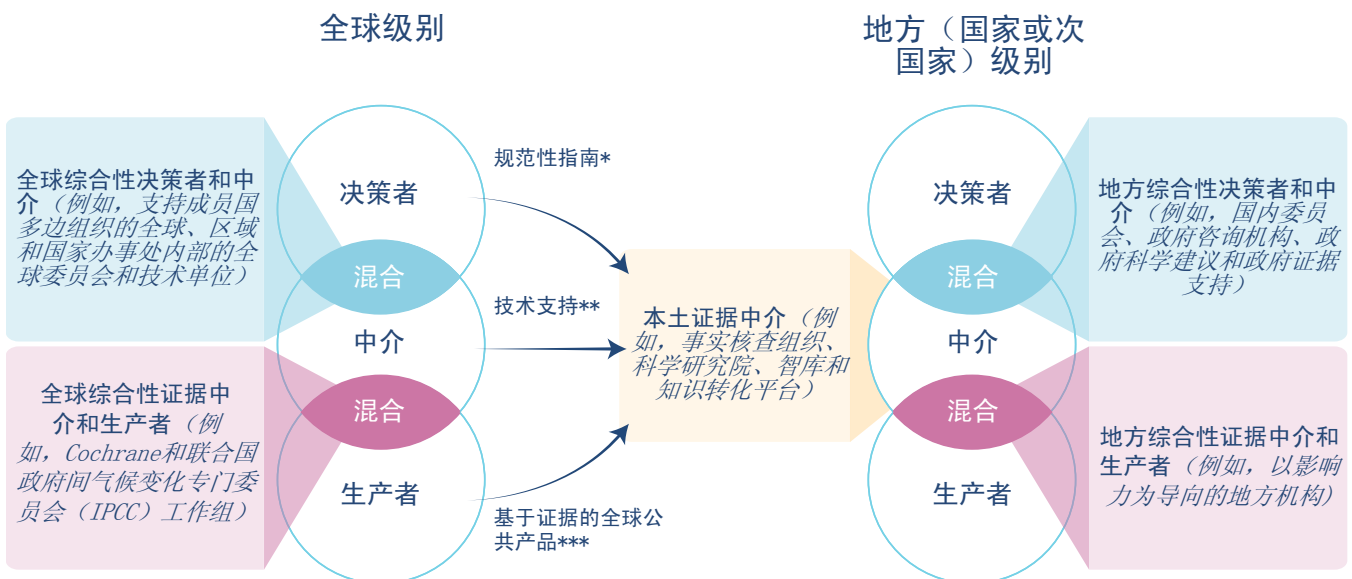
全球公共产品和公平分配能力的需求

支持使用证据应对社会挑战的人们深刻地认识到一个悖论，即证据中介所依赖的**全球公共产品**存在巨大差距的同时，这些全球公共产品生产和支持使用的方式又造成了巨大的浪费。与证据相关的全球公共产品及其相关功能包括：1) 稳健的优先排序、协作以及注册流程，以确保生产正确的全球相关证据（例如证据综合），并避免资源浪费；2) 严格的标准，以确保最佳证据可用于决策，例如根据提供的证据级别对证据体进行分级；3) 开源期刊，以确保在需要时可以免费获取最佳证据；以及4) 稳健的优先排序，以支持证据中介使用全球公共产品支持决策制定。

支持证据使用所需的能力应包含四个维度：

- 纵向跨级别（全球和地方，其中地方可以指国家、州或省、市辖区以及大型机构），若涉及与证据相关的全球公共产品（例如，全球最佳证据综合），或存在关于规模经济的有力论据，则应将能力集中于全球
- 跨领域职能（使用证据的决策者，支持使用证据的证据中介，以及八类证据的生产者），使其能力集中在比较有优势的地方
- 横向跨当地司法管辖区，在所有司法管辖区公平分配使用和支持使用证据的能力（无论是高收入还是中低收入国家）
- 在跨社会挑战（或可持续发展目标）中发挥实质性作用。

我们将在下文说明第一和第二个维度。



*例如，联合国大会决议和联合国机构准则

**例如，以最佳证据回答问题的能力

***例如，Cochrane证据综合和IPCC模型

建议

我们把重点放在那些最有能力做出必要变革的人，以确保通过一致的方式使用证据应对社会挑战。这主要包括：

- 多边组织，如：联合国系统、多边开发银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二十国集团（G20）等
- 国家和次国家各级政府的政策制定者
- 组织领导、专业人士和公民
- 证据中介，包括那些目前不充当证据中介的人员（例如大部分的新闻工作者）
- 证据生产者，特别是那些从事生产和支持使用数据分析、建模、评价、行为/实施研究、定性见解、证据综合、技术评估/成本效果分析和指南，并以影响力为导向的单位。

在此，我们以信息图的形式概述证据委员会的24条建议，其中八条最重要的建议使用粗体表示。它们的重要性源于它们如何提供框架[1, 4, 13]、结构和流程[5, 14, 15]、责任[3]或资金[24]，许多其他行动可以遵循这些方面。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在这些建议（如报告的其他部分）中使用“证据”一词表示研究证据，特别是在前面描述的所有八种形式的证据（数据分析、建模、评价、行为/实施研究、定性见解、证据综合、技术评估/成本效果分析和指南）。我们使用的“最佳证据”是指在一个特定的国家（或次国家）背景下，从最佳可用研究中得到的国家（或次国家）证据（即在环境下学到了什么）和从最佳可用证据综合中获得的全球证据（即从世界各地学到了什么，包括其不同群体和环境下的差异）。



所有可以采取行动的人

两条建议，一条是警示[1]，另一条是提出新的回应标准，即任何时候提出的主张（如这种干预措施是有效的）要求提供证据时的回应标准[2]



多边组织

两条建议，一条呼吁**多边组织做出决议**[3]，另一条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报告[4]



政府政策制定者

七条建议：
• 四条呼吁建立符合目的的国家（和次国家）**证据支持系统**（和更广泛的证据基础设施）[5]、证据支持人员和伙伴关系[6]、科学顾问[7]和咨询机构[8]
• 一条呼吁建立更多样化的证据库[9]
• 两条与开放科学[10]和人工智能[11]相关



组织领导、专业人士和公民

两条建议：
• 要求每个重要的组织协会、专业机构和以影响力为导向的民间社会团体对其国家（或次国家）的证据支持系统做出有意义的贡献[12]
• 一条是呼吁公民考虑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最佳证据**的多种方式，并考虑支持能够实现这一点的政治家（和其他人）[13]



证据中介

三条建议：
• 一条针对**专门的证据中介**[14]，另一条针对**新闻和社交媒体平台**[15]
• 一个更普遍的要求是及时并响应迅速地将最佳证据与所提问题相匹配[16]



证据生产者

七条建议：
• 五条解决以下方面的作用：1) 填补空白并遵守标准[17]；2) 响应、转介或与他人合作[18]；3) 向其他部门的证据小组学习[19]；4) 为全球紧急情况做好准备[20]；和5) 使证据易于理解[21]
• 一条专门针对学术机构[22]，另一条针对期刊[23]



资助者

一条建议呼吁在**证据支持方面支出“更明智”**，理想情况下更多，尤其是在国家（和次国家）证据支持系统和更广泛的证据基础设施方面[24]

下面列出的是八个最重要的建议。对于每条建议，我们均列出报告的相关小节，提供支持该建议的环境、概念或词汇（按其介绍的顺序排列）。在相关的情况下，我们还列出了与证据委员会建议一致的全球报告。全球委员会报告通常仅与建议的一部分或其理由相一致（例如，关注公平性，投资于某些特定形式的证据（例如评价）以及让决策者承担责任），而来自其他全球实体的报告往往更加一致。



所有决策者、证据中介和以影响力为导向的证据生产者

1

警示 — 决策者、证据中介和以影响力为导向的证据生产者应该认识到问题的规模和性质。政府政策制定者、组织领导、专业人士和公民并未系统地使用本报告中提到的所有八种形式的证据以公平地应对社会挑战。相反，决策者往往依赖于低效（有时是有害）的非正式反馈系统。结果则是糟糕的决策，导致无法改善生活，对公民造成可避免的伤害以及资源浪费。

参与COVID-19决策的决策群体，特别是高级别政府政策制定者，目前对使用多种形式的证据和利用支持其使用的策略有了直接经验。他们对导致证据被忽视或滥用等可能出现的挑战也有直接经验。他们可能还听说其他国家的同行可以获得的证据支持，如动态证据综合，并想知道为什么在他们自己的国家不可获得或不可使用这些证据。这个群体具有独特的优势，可以将大流行之前和期间成功经验系统化，并建立或改进各自国家的证据支持系统，以解决不成功的地方。

相关章节： 4.13众多COVID-19证据支持系统的不足 | 6.2支持证据使用所需的公平分配能力 | 4.1决策中常见的证据形式 | 4.7 动态证据产品



多边组织

3

多边组织的决议 — 联合国、G20和其他多边组织应通过一项决议，使这些多边组织及其成员国承诺扩大其对证据的概念，并支持与证据有关的全球公共产品以及公平分配生产、分享和使用证据的能力。旨在支持联合国从2021年到2025年转型的“变革五要素”明确包括数据分析和行为/实施研究，隐含地包括评估（在“绩效和结果导向”下），但对其他所需的证据形式却未提及。(1)联合国和其他多边组织（包括它们赞助的全球委员会）继续依赖“专家最了解”的模式。联合国秘书长科学咨询委员会的振兴提供了一个可以做得更好的机会。(2)可以从那些率先采用更系统、更透明的证据使用方法的组织中学到很多东西，如：世界卫生组织（WHO）的指南审查委员会（制订规范性指南）和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相关章节： 4.2常见证据形式的定义 | 6.1支持证据使用所需的全球公共产品 | 6.2支持证据使用所需的公平分配能力 | 5.5联合国下设机构在其工作中对证据综合的使用 | 7.1全球委员会建议分析的启示 | **统一报告：** (3)*

* 请注意，参考文献中所提及的统一报告可在全文报告中查阅。

4

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报告 — 世界银行应在即将发布的《世界发展报告》中专门提供全球、区域和国家所需的证据体系架构设计，包括对与证据相关的全球公共产品以及公平分配的证据生产、分享和使用能力的必要投资。世界银行向“知识银行”迈进的步伐过于试探性。他们迄今为止的工作强调了某些形式的证据（如数据分析），却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其他形式（如证据综合）。一份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报告可以建立一种关于证据和证据使用的通用语言，即决策者、证据中介和以影响力为导向的证据生产者等每个人都可以使用。它还可以列出许多做得更好的步骤，包括世界银行的作用，以及其全球伙伴关系和其他联合国机构在支持与证据相关的全球公共产品（如证据综合）方面的作用。

相关章节：6.1支持证据使用所需的全球公共产品 | 6.2支持证据使用所需的公平分配能力 | 1.6使用证据应对社会挑战的关键事件时间线 | 统一报告：(4)



政府政策制定者

5

国家（和次国家）的证据支持系统 — 每个国家（和次国家）政府都应该审查其现有的证据支持系统（和更广泛的证据基础设施），通过内部和伙伴关系填补差距，并公开报告进展。例如，许多政府没有证据支持协调办公室、行为洞察部门、证据使用手册和相关指标，以及理想证据支持系统的其他特征（如第4.14节所述）。每个政府还可以审查其“主流”结构和程序（如预算、规划、监测和审计），以正式确定证据的“输入方式”。若没有正确的证据支持系统，工作人员将没有能力、机会和动力在政府决策中使用证据。

一些政府可能会选择在立法中正式规定其效力，如美国的《循证决策基础法案》。许多政府还可以支持在组织领导和专业人士的日常工作以及公民的日常生活中使用证据，并在其工作中明确尊重原住民权益及其认知方式。

相关章节：4.14国家证据基础设施的理想特征 | 3.3政府政策制定者及其使用证据的环境 | 4.10原住民权益及其认知方式 | 统一报告：(3)



组织领导、专业人士和公民

13

日常生活中的证据 — 公民应考虑根据最佳证据就其及家人的福祉做出决定；把钱花在有最佳证据支持的产品和服务上；自愿为那些使用证据来决定做什么和如何做的倡议投入时间和进行捐款；支持那些致力于使用最佳证据来解决社会挑战，以及那些承诺（与其他人一起）支持在日常生活中使用证据的政治家。除其他外，政府政策制定者需确保公民能够获得最佳证据、经证据核实的主张，以及易于使用的有证据支持的资源和网站等，以便在任何时候做出明智的选择，而不仅仅是全球危机期间。他们还需要帮助建立公民的媒体和信息素养，提供必要的透明度，让公民知道决策、服务和倡议是否基于最佳证据，并更广泛地创造一种理解、重视和使用证据的文化。

相关章节：3.6公民及其使用证据的环境 | 4.11错误信息和信息疫情 | 统一报告：(3; 5; 10; 16; 18; 19)



证据中介

14

专门的证据中介 — 专门的证据中介应该挺身而出，填补政府留下的空白，在政府工作人员频繁更替时提供连续性，并利用与全球网络的紧密联系。证据中介介于决策者和证据生产者之间，为前者提供最佳证据支持，为后者提供利用证据产生影响的洞察力和机会。与政府的科学顾问一样，中介需要能够发现和交流各种形式证据，并维持（至少是一部分）高效能的证据支持系统。COVID-19已经在某些国家的某些时候显示出中介与社区领袖合作的价值，即让那些过去可能因不当生成、共享或使用的证据而受到不良服务的人参与进来。

相关章节：5.1证据中介的类型 | 5.3证据中介使用的策略 | 4.2常见证据形式的定义 | 4.14国家证据基础设施的理想特征 | 1.7公平性考虑 | 统一报告：(8; 20)

15

新闻和社交媒体平台 — 新闻和社交媒体平台应与可以帮助利用最佳证据来源的专门证据中介，以及可以帮助有效传达证据并确保其算法呈现最佳证据并抨击错误信息的证据生产者建立关系。新闻工作者和事实核查人员需要熟悉证据综合，并利用它们就获得的任何证据以及可用于替代最佳证据的任何“其他证据”提出具体问题。熟悉的证据综合包括：在更广泛的证据体系中本土化和定位新研究的重要性；与单一、小型、执行不力的研究相比，更倾向于综合高质量研究的理由；科学不确定性的概念；证据的演变性质及其与新兴和替代指南的联系；偏倚和利益冲突的重要作用和作用；以及避免“杜撰”报告的重要性。

相关章节：5.1证据中介的类型 | 4.4本土和全球证据的相互作用 | 4.8最佳证据与其他证据的对比（以及如何从其他证据中获得最大收益） | 4.11错误信息和信息疫情 | 统一报告：(21; 22)



资助者

24

资助 — 政府、基金会与其他资助者理论上应在证据支持上“更聪明”，理想状态下应投入更多的资金。他们可以承诺确保将1%的资金分配给国家（和次国家）的证据基础设施（如第4.14节所述，为证据支持系统和证据实施系统提供合理的份额），同时监测标准的遵守情况。如果世界银行和其他联合国机构等多边组织未承担分配这一责任，他们可以确保将10%的资金分配给与证据相关的全球公共产品。高收入国家政府和全球资助者可以将其国际发展资金的1%用于公平分配的证据使用能力。

相关章节：4.14国家证据基础设施的理想特征 | 6.1支持证据使用所需的全球公共产品 | 6.2支持证据使用所需的公平分配能力 | 统一报告：(3)